



书评

《张礼千文集》

廖文辉编，《张礼千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ISBN：978-983-35274-9-6

严春宝*

(YAN Chun Bao)

没人会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对东南亚地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古代王国朝觐中国的诸多记录，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友好往来的确凿证据，也是反映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动态轨迹。然而，一个同样让人不得不承认、又让人稍觉尴尬的事实却是，虽然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华人聚居地，但华人学术界针对东南亚所展开的学术性研究，却是步西方学者的后尘而后发后始的：目前盛行于学术界中的所谓东南亚研究，其实是源自于西方和日本对东南亚研究的基础上。由于西方和日本研究东南亚的根本目的是在于维护西方的殖民统治和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那么，在西方和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中，处处隐藏和伴随着浓厚的殖民意识也就在所难免了。譬如，以西方为观察问题出发点的东南亚研究，多注重对当地经济、地理、矿产资源等方面的研究，却缺乏对居住在东南亚各地庞大的华人族群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不会主动涉及众多排华事件曾经带给华人的苦难历史，就算偶尔不得已提及华侨华人对发展东南亚的贡献，“西人赞美之言，均偏于劳力实业，而于吾侨目前之学术文化则绝无一词。”（上卷，页365）至于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则因其出于侵略和分化东南亚各族人民之目的，其“所著南洋之书中，未免含有挑拨民族之意”。

（上卷，页366）显而易见，要全面、真实地认识、反映并研究东南亚，就必须突破由西人和日本人所划定的东南亚研究藩篱，以“我”为中心，开辟出一个以华人世界为观察问题出发点和参照体系的、拥有自身观点和特色的研究领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南洋研究，既是对西方和日本东南亚研究的超越，也是基于维护华人世界自身利益考量的重要结果。

由新马一批最早研究南洋问题的学者，即，姚楠、张礼千、许云樵、刘士木等人所开创的南洋研究，不仅涵盖了所谓的东南亚研究，它也将中国或曰华侨华人自身及其文化纳入其中：在南洋研究中，中华文化要素不再仅仅只是一个被观察者或被研究者，它同时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积极的活动者和参与者。南洋研究这一学术体系的创建，就在于它突破了西人和日本人在东南亚研究中的狭隘视野，而将整个东南亚区域

* 严春宝博士 中国海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电邮地址：ycb88@163.com

内各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在南洋研究中，中华文化不止是被研究的对象，更是南洋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参照物。

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人都知道，虽然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唐宋时期，然而有关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状况的文献史料却一直非常匮乏。导致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早期出洋的侨民大都是处于社会底下层的穷苦民众，且多为文盲，自然不能寄望于他们记录下他们的苦难生活史；其次，海外华人所处的基本上都是商业社会，富裕的商人中虽不乏通文识字者，但在重商轻文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亦没有闲情逸致去记录下他们的经商过程。作为统治者的殖民地政府关心的是如何更多地掠夺当地人的财富，他们才不会关心华人是死是活；至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则由于明清以降所实施的海禁政策，导致移居海外的侨胞被视为“天朝弃民”，朝廷当然就更不可能去收集、记录有关海外侨胞的史料了。

中国国内对于海外侨胞的关注或曰研究，第一波浪潮应该说始自于晚清以降，而真正对华侨华人问题展开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则无疑出现于民国期间。一方面是海外侨胞受到康有为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萌生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海外华人华侨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政府再也不能漠视海外侨胞的生存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并加入到了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队伍中。这一时期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学者，许多人都拥有长期的在地观察和生活的经验，因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才能做到精准、全面而扎实。这期间涌现出了大批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名家学者，譬如极力倡导南洋研究的张礼千就是其中之一。因痛感于国内学术界不仅“南洋学术之荒落，未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即便是仅有的一点儿研究成果，亦是“误解者多，透达者少”，（上卷，页138）张礼千对南洋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张礼千对南洋问题的研究可说非常全面，从中国古代典籍到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的有关著述，从山川地貌、物产资源到人员组成、人口分布，从东西洋交通到南洋各地历史，从人名地名到南洋动植物乃至珍稀果品等皆加以考究。犹为难能可贵的是，张礼千在进行南洋问题研究的时候，是自觉地以华人自身为参照出发点的，对于久居南洋各地的华人华侨所曾经遭遇过的重重苦难，张礼千给与了深深的同情和强烈的关注，可说是完全具备了华人自己的视野。譬如，张礼千对泰国排华事件的记录，就让我们看到了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今人咸以为泰国是一个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最成功的国家，甚至有泰国政客以“泰中融合之深世界独一无二”自诩。而张礼千却以一个文化人的自觉，通过对泰国取缔华侨教育、封闭华侨报馆等一系列排华措施的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暹罗排华，手段最毒辣”：“摧残华侨教育，旨在使华儿同化”，（上卷，页85）这显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排华了，而是以最终消灭华人为目的。要知道，消灭一个民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割除它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正如张礼千所忧虑的那样：“国土之亡原不足惧，惟国民性之亡始为可忧”，（上卷，页11）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了，这个民族也就真的彻底灭亡了。

张礼千对南洋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积极参与发起创办专事南洋问题研究的南洋学会。曾久居南洋的张礼千深感中国学术界在南洋研究问题上的落后：“凡有南洋之译著者，即誉之曰南洋专家，凡有南洋之论文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即称之曰南洋通”。



（上卷，页144）为了打破西方和日本在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垄断，争取在南洋研究中的更多话语权，“推动国人对南洋学术作专门研究之风气，以打破往日拾人牙慧，故步自封之陋习，与国际学术界相切磋。”（许云樵语）张礼千联合同道好友姚楠、许云樵、刘士木、李长傅、韩槐准、关楚璞、郁达夫等人，终于1940年在新加坡正式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后改称“南洋学会”）。南洋学会不仅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问题的学术团体，今日更已成为海外华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团体，为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2年之后，新马沦陷于日寇的魔掌之中，而这时已经回到国内的张礼千，仍然“积极开倡南洋研究之风气，实地推动专门机关之设立”，（上卷，页107）除了为当时的教育部筹备南洋研究所之外，为了避免南洋学会的工作陷于停顿和被日寇所利用，他协同姚楠和朱杰勤将南洋学会搬迁至当时的陪都重庆，继续为南洋研究贡献心力。仅此而言，任谁也无法否认张礼千对南洋研究曾经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第二波高潮。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吸引到的海外投资主要源自于侨资，这就使得华侨华人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与第一阶段从事南洋问题研究的学者大都拥有长期海外生活的阅历相比，这一时期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多数学者则恰恰欠缺了这一优势。尤其是经过几十年的长期隔阂后，海外华人华侨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与国内有了天壤之别，这极大地影响了国内学者对海外华人华侨社会的正确理解。因而，就学术研究成就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及其水准似乎远不能与前一阶段的山洋研究相媲美。

众所周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最欠缺的就是文献资料不足。笔者常有这样的感觉：前辈学者通过他们的实地生活经验、调查研究和田野考察，形成了最早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之后的研究者则以此为基础，又形成了“新”的研究成果；再后，更晚起的学子们再在上述基础上撰写出了“更新”的第三、第四……等等N批次的研究成果。就在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一次次稀释过程中，华侨华人研究也逐渐变得失真起来，这在无形之中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向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发展。

近年来，马来西亚学术界借助于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条件，以立足于本土和区域的眼光，开始重新审视、并重视对华人华侨问题的研究，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新纪元学院的“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南方大学学院的“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等，也重新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华人华侨问题研究的著作，譬如，由新纪元学院廖文辉博士主编、被收入新纪元学院学术丛书系列的三卷本《张礼千文集》（新纪元学院，2013年2月出版），就堪称是一套鸿篇巨著。廖文辉博士不惮资料搜集过程的艰辛，编纂出版《张礼千文集》，让许多久已接近失传的张礼千著作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对于维系南洋研究的历史延续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洋洋洒洒百万余字、上中下三大卷的《张礼千文集》，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很多现在已经难于见到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另一段不太一样的华人华侨历史。不管是从保存文献史料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华人华侨问题的研究来说，其意义与价值都是无法预估的。



从近年来马来西亚学人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来看，许多从事华人华侨问题研究的学者，不仅无意中承继了当年南洋研究中重视和维护华侨华人自身利益、并以之作为研究问题出发点的优良传统，甚至于更进一步地有所发展，在立足于本土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于对“华人研究”问题的思考。就此而言，说当下马来西亚学人所热衷的“华人研究”是早年南洋研究的凤凰涅槃新生，似乎亦不为过。

“为往圣继绝学”！手捧朴实厚重、印刷精美的三大卷《张礼千文集》精装本，笔者最大的感想就是：向前辈学者学习，向编纂者致敬！